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新常态”下九大趋势的联动性与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杜 创

编者按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涉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上述九种趋势之间的关系、促使其出现的深层次因素及对政策的启示。

趋势性变化的联动性

总体上看，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涉及宏观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微观市场特点（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

经济发展从传统模式步入新常态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上述九种趋势的出现具有互补性或联动性质，即每种趋势不是孤立的，一种趋势的出现增强了另一种趋势出现的合理性，其相互作用从整体上使得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供给不足，消费需求呈现出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以及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的快速扩张，这三个因素互相加强，共同决定了市场竞争主要依赖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跑马圈地”是第一位的，质量型、差异化竞争并不重要。实现数量扩张的供给方基础则是以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为标志的投资模式，而大量低成本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又为数量扩张提供了充足廉价的生产要素。普遍性的数量扩张需求为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暂时有效性提供了微观基础，但无法避免投资的盲目性，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隐性风险随之逐步积累。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后，由于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以及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数量扩张的需求基础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及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数量扩张的生产要素基础也面临枯竭。综合起来看，现在简单数量扩张只会加剧产能过剩，需要适应个性化需求、寻找新的增长点，因此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竞争形态也将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随着需求和供给面的变化，各类隐性风险也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在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自然递减。

传统发展模式和“新常态”内部各特征之间具有联动性、互补性，而传统发展模式的某一特征与“新常态”的某一特征之间则具有替代性、相互冲突。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根本原因在于从传统模式转变到新常态，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因素转换，而是一个系统性、整体联动过程，各种趋势之间、趋势表现与深层次体制机制变革并不完全同步。例如，最终消费需求的转型可能相对较快，但是产能过剩的化解、经济风险的化解不可能一步到位，供、需脱节的矛盾将对微观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持续压力。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但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牵涉到行政审批、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等方方面面，许多深层次矛盾将一一显露出来，需要克服重重阻力。

助推新常态技术进步是关键

引起经济发展模式出现系统性、联动性趋势变化的深层次动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供给侧：生产要素存量的有限性。一定时间内劳动力供给、资源能源存量、环境承载力等都是有限度的，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要素使用量离此限度尚远，以至于可以忽略限度的存在。但是，随着数量扩张模式的持续推进，要素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资源约束逐步束紧，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将不可避免。

二是需求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的变化。消费需求代表了经济活动中的最终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低收入阶段温饱等基本需求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同质化产品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基本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需求逐步满足之后，更高层次的需求将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特征，对产品质量、差异性也会更加关注，简单重复的数量扩张已不能满足新形式的需求。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也对在个性化基础上开拓新的出口增长点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技术进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决定了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但是新的模式能否形成则从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拉动力”。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无法顺应需求的个性化，无法改变以污染环境、大量耗费资源能源为特征的生产模式。

总之，对深层次动因中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表明，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变到新常态具有内生性，即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转变的快慢则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

政策启示

对经济步入新常态趋势的联动性及关键推动力的分析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需要更深入研究各种趋势和体制之间的联动性关系。以融资体制为例，融资需求派生于投资需求。我国经济增长过去长期重复了简单粗放的数量扩张模式，依赖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其单项投资往往数额庞大、周期长，需要将大量公众储蓄汇集在少数大银行，才能集中力量为此类大型项目融资。这在工业化初期、需要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情况下是不得不然的选择，但也内生决定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必须以大银行为主导。但是从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上看，大银行并不适合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大银行层级多、组织结构复杂，直接的基层一线客户经理占比低，股权相对分散，由此决定其信息传递特征是，必须依赖于客观、可验证的信息才能保证不失真；而中小微企业难以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也缺乏抵押物，能够提供的多是一些难以被第三方验证的“软信息”，向大银行申请贷款难度大是自然的。更适合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是客户经理占比高、组织结构简单、股权相对集中的小银行，因为这样的小银行更适合处理“软信息”，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小银行优势”。这是过去许多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个体制背景。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即将出现。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需要为银行业注入新血。正是基于此，2014年我国在实质性放开中小银行准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第二，缓解转型阵痛需要顶层设计。缓解转型阵痛，使经济顺利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产业组织、市场需求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改革千头万绪，“顶层设计”的内涵之一是科学规划改革顺序，要牵住“牛鼻子”，抓住在体制、产业、市场各因素相互作用中影响大的领域破题，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在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加快改革；通过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倒逼”改革。

第三，建立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是根本。为此，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市场发现需求的机制，使技术进步顺应个性化需求方向；健全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容许创新产品得到“创新溢价”；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为创新提供市场原动力。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对个人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创新者来自创新的合法权益获得充足保护；优化对产品质量等的市场监管，使假冒伪劣者遭受严厉打击，无所遁形。

经济新常态相对传统模式的趋势性变化

	传统模式	新常态
消费需求	模仿型排浪式	个性化、多样化
投资需求	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出口和国际收支	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	全球总需求不振、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变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	供给不足	产能过剩，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生产要素相对优势	劳动力低成本	人口老龄化、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
市场竞争特点	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	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资源环境约束	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	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	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隐性风险在逐步积累	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	刺激性宏观政策	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

发展论坛

以内生活力 突破振兴瓶颈

张景辉

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沈阳老工业基地不断推动体制机制转型，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振兴成果广惠于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制约全面振兴的瓶颈问题仍很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这“两个归根结底”的重要论断，抓住了关键，也为老工业基地走向新一轮振兴指明了方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握机遇，坚持走创新驱动、内生发展之路，就是由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就是借力“外驱”但不依赖“外驱”，而是转身向内深入“挖潜”，立足自身练好内功，激发内生活力，切实打通制约内生增长的几个重要瓶颈。

以深化改革为统领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10年振兴，沈阳现代市场体系更加完善，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去年非公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的65.9%，增速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由于长期受传统体制的束缚，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仍不高。因此，在新一轮振兴中，关键是要缩回政府“有形的手”，真正还权于市场。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下好简政放权这步“先手棋”，在前三轮取消下放698项审批权限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企业、对微观事务的干预。特别是要更多地关注权力的彻底取消而非直接下放，关注下放权力的承接和后续管理，关注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各种涉企收费，切实提高放权的含金量。另一方面要放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的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更多的注重细化社会资本进入路径、制定完备的政策条款和设立专门项目运营监管部门。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项目，分类设计具体的市场模式和配套政策，保证企业参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时可以“对号入座”等等。

以结构调整为重点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当前，沈阳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转型动力不足、新兴产业尚在孕育，新旧增长点“青黄不接”的问题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以结构调整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老工业基地找到新动力源的关键。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适当调低“重”产业的比重，做长拓宽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两化融合“转换器”“助推器”“倍增器”的转换、改造和提升作用，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服务化和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抓住国家支持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支持沈阳与国际大型航空企业合作，设立军民融合示范区等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智能机器人、IC装备、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另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激发内需、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杠杆”作用，以打造铁西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为重点，统筹推进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发展，着力形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沈阳科技资源丰富，高校、科研院所云集，但长期以来受体制机制性因素影响，巨大的科研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因此，沈阳应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进创新，打造汇聚创新要素的“洼地”，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形成沈阳经济内生增长的不竭动力。沈阳将以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依托东北大学、中科院自动化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示范区内的科技成果使用、收益权等先行先试政策，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热情，推动其走出体制、创办企业，在全社会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充分发挥政府层面统筹协调推进作用，着力营造培育“苗企业”的创新环境，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以开放合作为动力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老工业基地要继续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势头，既要通过调整改造来提升存量，更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扩充增量。首先要放眼世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先行一步。随着中德合作逐渐步入“黄金期”，沈阳开始建立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业园区，目前，沈阳中德装备园的规划建设已经铺开。同时，我们也要立足国内。特别是要广泛拓展与央企合作的新领域、新空间，推动央企进一步融入沈阳振兴发展的大格局中。未来，沈阳还将不遗余力地吸引各方力量，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地加快与国内外各方的战略合作，以深层次的开放推动沈阳的全面振兴。

（作者系沈阳市发改委主任）

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黄 莉 邹世享

学术经纬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新型城镇化应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模式。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就要把农业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涵义

农业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产业的演进过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要用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

农村现代化就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民由分散居住走向集聚居住，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产业结构更加丰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农民现代化就是塑造懂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现代新型农民的过程。培育农民具有现代观念，乐于接受生活方式的改变。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种田能手，适应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要求。通过培训，使脱离农田的农民掌握一种专门技术、会经营、了解市场，具备在城镇二、三产业部门就业的能力。

二、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引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展城镇生产力是关键，发展城镇生产力能够带动农业生产力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引擎。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展涉农产业带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通过在城镇建立农机具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用物质运输站、农产品加工贸易公司等，辐射服务周边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展非农产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转移出来的部分农民提供产业支撑。

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用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效益，用机械化耕作代替手工和畜力耕作，用科技农业代替经验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样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互相支撑。

二是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引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以城镇化为方向，引领农村的社会建设，将城镇的公共建设引向农村，让农民生活向市民生活转变。要通过农村现代化建设，引导农民集约集聚居住，以市民社区化生活为方向，在乡村规划、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社区建设，既能节约耕地，又能改变农民散居的生活方式。在引导农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加大投入推进水、电、气、路、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人始终是现代化的主体，城镇化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关键是要塑造懂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现代新型农民，也就是要把农民塑造成两类人，一类是适应新型城镇化需要的非农产业工人，另一类是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业工人。通过农业现代化建设，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用市场经济观念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经营自己创造产品的能力；将企业管理理念灌输给农民，提高农民管理农业、精耕细作的能力。使农民在打造科技农业、生态农业、规模农业、精品农业的进程中，把自己塑造成为农业工人。

塑造农业工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走向新型城镇的非农产业工人，将不再是如今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农民工，而是要成为离土离农不离乡，在城镇具有稳定住所、稳定经济来源、具有一技之长的稳定工作的非农产业工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

（作者单位分别系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本版编辑 裴珍珍